

戏曲史视野中的《琵琶行》

郑尚宪

《中国戏剧》2001 年第 5 期

—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和《琵琶行》历来被誉为唐诗中的双璧，传诵不绝。然而二者在戏曲史上的命运却截然不同。元明清三代，取材于《长恨歌》的戏曲多达近三十种，而取材于《琵琶行》的戏曲仅寥寥数种。这固然因为《长恨歌》描写的是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热门题材，但另一方面也可看出《琵琶行》故事的难以入曲。

历史上第一个将《琵琶行》搬上戏曲舞台的是元代大戏曲家马致远。马致远的《青衫泪》套用了元杂剧中习见的士子、妓女、商人三角恋爱叙事模式，又承袭了宋元时期非常流行的“双渐赶苏卿”故事的框架。剧演白居易与妓女裴兴奴交好，后白居易被贬江州，裴兴奴被茶商骗娶，亦被带往江州。白居易月夜送客，听到兴奴弹奏琵琶，两人因而重逢。最后白居易官复原职，奉旨成婚，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种写法实际上体现了元代知识分子官场失意后，向情场寻求安慰，情场失败后，又从文场找补的一种精神胜利法。其情可悯，其成就却十分有限。马致远一生作杂剧十五种，现存七种中，以此剧成就最低。若不是语言还有一些文采，几乎不敢相信它出自马致远这么一位大家之手。

明代顾大典的《青衫记》沿袭马致远《青衫泪》的改编路数，又将白居易的形象进一步庸俗化了。它不仅写白居易冶游，而且写其宿娼；不但写了白居易与裴兴奴的爱情，而且又生出白妾樊素、小蛮与裴兴奴之间的纠葛，情节更复杂化了。和许多明代传奇一样，该剧以一件青衫作为贯穿全剧的中心道具，大做文章；为了满足双线结构的要求，增添了许多可有可无的穿插，实属败笔。假如说马致远的《青衫泪》已经曲解了白居易的《琵琶行》，那么顾大典的《青衫记》简直就是买椟还珠了，因而招致了历代有识之士的不满和批评。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清代蒋士铨的《四弦秋》传奇。

清代乾隆年间，扬州著名徽商、戏班班主江春在一次文人雅

集上愤然抨击：“《青衫记》院本，以香山素狎此妓，乃于江州送客时，仍归于司马，命意敷衍，庸劣可鄙。”并请当时在座的著名诗人、剧作家蒋士铨“别撰一剧”，“用洗前陋”。蒋士铨少享盛誉，长入翰林，本欲致君泽民，一展抱负，却因官场险恶，被迫壮岁辞官，寄居江氏篱下，郁郁寡欢，曾作诗道：“颓哉老翰林，醉眼看歌舞。感触不自知，当筵泪成雨。可怜谪仙人，犹咏襄阳估。”（《送同年薛补山编修归乐陵》）以这种特殊的身世阅历和心理感受去解读《琵琶行》，必然产生高度的共鸣。而且蒋士铨又是有清一代屈指可数的大诗家和著名的史学家，这决定了他在改编时能够正确解读原诗，并以严谨的史笔和过人的才情重现白居易的原来诗意。果然，蒋士铨改编的《四弦秋》完全摒弃了马、顾二作的爱情故事模式，而严格按《琵琶行》诗作原意，还参照了《新唐书》元和九年、十年史实及白居易在《琵琶行序》中所提供的材料，以琵琶女作为贯穿全剧的核心人物，通过琵琶女的身世悲欢、人生感叹隐喻发挥，深刻表达了封建社会中许多襟怀不凡而又壮志难酬的知识分子的郁闷和悲愤。作者着意淡化了男女之情，突出了“天涯沦落”、同病相怜的主题。

在具体改编中，蒋士铨严格遵循原诗的规定情境，注意强化情绪的宣泄和心理氛围的营造，与原诗着重抒情的风格保持一致。《琵琶行》是一首长篇抒情叙事诗，诗人所要表达的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失落意绪。至于这种感同身受的共鸣式情愫所由产生的事件，则只是作为诗歌的背景作简单的交代。因而全诗详于抒情，略于叙事，写琵琶女子自诉身世详昔而略今，写诗人自己的遭遇则对迁谪之事不置一词。蒋士铨在吃透原诗精神实质的基础上，为了适应舞台表演的需要，对原诗作了大胆的剪裁和重新布局，把原诗“情”背后所蕴含的“事”有效地转化为舞台形象。作者用了三出篇幅，对琵琶女沦落风尘的不幸遭遇和白居易忠而遭贬的事实作了必要的交代。另一方面，蒋士铨也认识到《琵琶行》所要抒写的，不仅是一个妓女沦落风尘、志士蒙尘的故事，而是这个故事背后所隐藏的沦落之恨。因而，《四弦秋》并不刻意追求情节的曲折性，也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而是抓住两人当时的处境，借助必要的情节、人物动作和语

言，揭示人物内心的感情，以情作为贯穿全剧的线索，並以感情的高潮收束全剧。

正是从上述整体构思和表达题旨的需要出发，《四弦秋》从琵琶女花退红的家庭生活起笔，设计了一个叫吴名世（即无名氏）的人物给她做丈夫，展开了他与花退红之间的矛盾。通过几个典型细节，以花退红的痴心多情与吴名世的重利寡情形成鲜明的对比，点出花退红所遇非人、孤独寂寞的婚姻生活。作者没有在花退红与其丈夫的矛盾方面花太多笔墨，而是重在揭示他们平静的生活表面下深刻的内心分歧，从而突出琵琶女内心深处难言的孤独。对这种孤独，蒋士铨和白居易有着共同的感受。所谓“回忆酒阑歌散，何异热官迁谪”，这是白居易的感叹，也是蒋士铨的感叹。而剧末那一句“琵琶呀，则靠你弹出我一声声子规襟上血”，既是琵琶女悲凄、激切的心声，也是蒋士铨创作此剧时的内心呼唤。

《四弦秋》的头三出让白居易和琵琶女交替登场，为剧末的高潮蓄足情势。第四出一开场，“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以白居易原诗入曲，一下子就把观众带到了白诗的意境中去。别情依依之际，一阵铮铮之声传来，花退红携琵琶上场，在“似人语凄凉”的琵琶声中，花退红声泪俱下的悲诉唤起了白居易“同一样天涯愁急”的内心隐痛，从而放声大哭：“看江山不改人相代，叹儿女收场一样哀，……教那普天下不得意的人儿泪同洒。”在这里，蒋士铨和白居易一样，都在借琵琶女酒杯，浇自己胸中垒块。真可谓千古才人，同声一哭。

蒋士铨是清代中叶屈指可数的大诗家，他的《四弦秋》立意既深得白居易《琵琶行》神韵，文辞又十分典雅精美，描情摹态，传神逼真，因此深得时人赞誉。江春称它“征引不出本事，而闺房婉转，迁客羁愁，描摹镂刻，一一曲尽其妙。”其家班搬演时，“观者辄唏嘘太息，悲不自胜。”（江春《四弦秋序》）该剧从此盛演不衰，直至道光年间还是京城各戏班常演的剧目。其中《送客》一出至今昆曲舞台上还偶有上演。

时光流转，眼看到了二十世纪末叶，梨园怪才王仁杰再次把目光

投向了白老先生的《琵琶行》。然而在动手改编之前，他不能不考虑两个十分现实的问题：一是《琵琶行》究其实质上来说，是一首重在抒情的叙事诗，其故事成分相当稀薄，要写成以叙事见长的戏曲，难度很大，这正是前代曲家很少措手、难以成功的原因；二是以往改编此诗入曲者虽然不多，但均非等闲之辈，其中马致远是元曲第一流大家，顾大典是明代传奇名家和吴江派中坚人物，蒋士铨又是世所公认的最后一位传奇大家。几大名家在前，要想后来居上，谈何容易！何况顾、蒋二人所作都是昆剧，蒋作又已取得相当成就，现在再把《琵琶行》写成昆剧，艺术语汇相同，极易重蹈窠臼。

然而王仁杰的《琵琶行》还是给了我们一些惊喜。首先，他和蒋士铨一样，摒弃了男女爱情模式，沿着白居易原诗的思路，专写沦落之恨，追求一种高格调，所谓“非关风月，花草无涉”。这样避免落入廉价的俗套，得以专心在抒情诗戏剧化方面下功夫，有利于主题的深入挖掘。

其次，作者将原诗对琵琶女当年卖笑生涯的几句追述演绎成整整一场《拨酒》，极力渲染其年轻时期的大红大紫，以便和后来的沦落形成落差；又将“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两句诗形象地演化为《商别》一出，恰到好处地为全剧的重头戏即第三出《相逢》作了必要的铺垫。不难看出，这两出戏分别脱胎于蒋士铨《四弦秋》第三出《秋梦》和第一出《茶别》，但又另出机杼：《拨酒》与《秋梦》异曲同工，《商别》比《茶别》简洁明快。至于第四出《失明》，写琵琶女挥泪为《琵琶行》谱曲三年，终于泪尽失明；第五出《余音》，写二十五年后白居易以垂暮之年再到江州，重会白发苍苍、沿街卖唱的琵琶女后凄然离去，则完全是作者的创造。这样一来，故事情节大大丰富，可看性增加不少。更重要的是，如此一改，大幅度增加了琵琶女（在此剧中叫倩娘）的戏，全剧的主角也从白居易转换成倩娘。而描写女性，特别是美丽、善良而又不幸的女性，历来是王仁杰的拿手好戏。全剧因此而鲜活了起来，这是王仁杰超出蒋士铨的地方。

再次，《琵琶行》的题材决定了它必然是一部诗剧，而被誉为

“最后一位优雅的古典诗人”的王仁杰，其诗词造诣历来为人所称道。以“优雅的古典诗人”来写古代大诗人题材的诗剧，当然再合适不过。于是全剧无论语言，还是意境，处处充溢着诗意之美，与昆剧那古色古香的剧种风格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世人推崇元曲，多因其语言优美而又本色。若细加寻绎，则不难看出，元曲的语言，主要得益于以下两途：一是熔铸诗词语言入曲，故而优美；二是提炼方言俗语入曲，因此本色。以此观照王仁杰的《琵琶行》，其语言方面深得元人壶奥。剧中既有“素月，孤舟，大江寒，朝夕对愁眠”的凄清，“望断咸京，梦入轩窗，天际哀鸣一雁行。……数孤栖，叹凄凉，琵琶声咽，酒入愁肠”的幽怨，也有那“铜窟笼，缠在你头上，算盘儿，挂在你颈上，账本儿，勾在你胸上，白镪儿，塞在你嘴上。那金山与银穴，是你温柔乡，发财梦，祝你一梦到天亮！”的大白话诙谐。至于那写闹热场面的“轻盈盈香车宝马，美艳艳越女吴娃。但只见华灯初上夕阳斜，风微微卷起了绿窗纱。那耳畔音袅袅笙箫琵琶，音袅袅笙箫琵琶”，写卖笑生涯的“残酒对灯花，等闲十载生涯，赏不足，嫣红紫姹，看不尽，翠袖乌纱。曲终人散后，你道是多情芽，曾风雅？还是残盅冷炙，虚掷了年华？”写美人醉酒的“软绵绵，玉山倾颓，昏沉沉，眼儿生花。迷蒙蒙，分不清秦楼酒、谢家茶，倒颠颠，俺画梁看作秋千架。懒慵慵，奴醉欲眠君且去，闹纷纷，明朝车马喧哗，乱烘烘，新人旧客来纷沓。”等等，等等，都是臻于化境的曲家妙语。

由于在剧情、格调、人物形象、语言等方面都有着独特造诣，王仁杰成功地将白居易的千古名篇《琵琶行》搬上现代戏曲舞台，并对原作在故事情节上作了创造性的丰富和发展。这是必须予以充分肯定的。

然而，现在的《琵琶行》也还有不少可以商榷的地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白居易当年被贬江州，主要是因为锐意革新弊政，写诗揭露现实得罪了权贵，而被以莫须有罪名赶出朝廷。忠而被贬，有志难酬，心情十分郁闷，所谓“谪居卧病浔阳城”，正是白居易人生最低谷的

写真。因此三年后被调任为忠州刺史时，他极为兴奋，曾献诗提携他的宰相崔群：“提拔出泥知力竭，吹嘘生翅见情深。……忠州好恶何须问，鸟得辞笼不择林。”（《除忠州寄谢崔相公》）《琵琶行》的写作，正反映了白居易在江州时穷愁、郁闷的悲愤心情。而现在剧中写他在江州的生活是那么的怡然自得：“司马闲官，正从容，诗酒山水间。长伴妻孥亲鲜、樊素小蛮。作吏隐，山高皇帝远。兀的不令人心欢。”甚至当其友人表示去京城后将为其洗刷不白之冤时，他还自称一心求闲适，不必多此一举。如此构思，本意可能是为了突出白居易的高洁，但实则贬低了白居易，因为当时的白居易还是血气方刚，锐意进取，一心想为国为民干一番大事业的。这样写既与史实不符，又使剧情缺乏铺垫，后面的泪湿青衫、大慟作《琵琶行》，也就失之突兀了。与其相关的还有一个细节，即剧中提到的樊素、小蛮二人。白居易晚年官高爵显，过着优游自在、纵情声色的悠闲生活，为满足其声色之娱，曾蓄有樊素、小蛮二妾，这是事实。不过他在江州时并无雅兴，也没有条件纵情声色，这也是事实。何况若揆诸史实，白居易被贬江州时樊素、小蛮均尚未出生。写戏固然不同于写历史，可以虚构，也需要虚构，但要看有无必要。像现在把二人拉进剧中，不但毫无必要，而且纯属多余。总之，可能是晚年的白乐天给后人留下的印象太深了，作者在写作时一不注意，就将晚年那位怡然闲适的白乐天混同于年轻时锐意进取的白居易了。这种误解在顾大典、蒋士铨的剧中都已存在，王仁杰的失误在于不该重复这种误解。“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是白居易《琵琶行》最精辟之处，也是历来最能打动人的地方。马致远的《青衫泪》、顾大典的《青衫记》都将白居易和琵琶女写成是旧相识，甚至是旧情人，不但落入俗套，而且白诗中最精警的这两句诗落了空，因此历来为人诟病。上海昆剧院演出王仁杰的《琵琶行》时也将它们制成对联，高挂台上。然而全剧一开场就演倩娘歌唱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而白居易亦已久闻倩娘之名，两人在京城虽未谋面，但已相互知慕，到了江州才有机会相逢。这样写多花了不少笔墨，又削弱了“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人魅力，实属无谓。反而不如蒋士铨《四弦秋》按原诗路数处理得好。

何况白居易写《琵琶行》，原不过借以抒发自己胸中郁闷，究竟有否琵琶女其人其事，都是一个问号。宋代的洪迈、清代的赵翼都曾指出该故事乃出于白居易虚构，颇为前人赞同。因此改编时若刻意坐实，反失空灵。

白居易的《琵琶行》艺术上的最大成就，就是绘声绘色地用文字再现千变万化的音乐形象，并通过这种音乐形象和对琵琶女弹奏音乐过程的描绘，完成了对琵琶女悲剧形象的塑造，为琵琶女的半生遭遇谱写了一曲扣人心弦的悲歌，从而引出天涯沦落、同病相怜的主题。中国古典文学中描写音乐的作品汗牛充栋、指不胜数，然而历来公认《琵琶行》写得最好，最为经典。王仁杰改编《琵琶行》时注意到了琵琶女作为被侮辱、被损害的艺妓身份，以琵琶女与白居易的相逢为契机，增头加尾，用诗剧形式展示了琵琶女悲剧性的一生。这种结撰方式给舞台音乐留下很大的创作空间和发挥余地，也为它成为一部音乐剧提供了可能。从世界上看，音乐剧在 19 世纪末形成之后，它熔戏剧、音乐、舞蹈于一炉的独特方式立即赢得人们的喜爱，在欧美已盛行了一个世纪。80 年代传入我国后，也得到迅速发展，被认为是一个很有前途的戏剧生长点。而中国戏曲本来就综合了音乐、舞蹈等多种艺术成分，昆剧更以载歌载舞见长。所有这一切，都为《琵琶行》成为一部典雅优美而又富有创新精神的音乐诗剧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而先人也确实为我们留下了无数极端优美的琵琶曲，若能从中精选一些结合进剧中，让观众在观赏戏剧表演的同时也得以欣赏优美的琵琶音乐，当可大大增强其艺术魅力。在这方面，戏曲史上已有非常成功的先例。如唐代“安史之乱”后，宫廷乐工李龟年流落江南卖唱为生，杜甫因之写了《江南逢李龟年》一诗寄寓今昔之感，清代洪升创作《长生殿》时就将之敷衍成《弹词》一出。由于吸收了[九转货郎儿]一套名曲，上演后极受欢迎，成为经典折戏，盛演不衰。而现在《琵琶行》的演出，西洋乐器倒用了不少，优美的琵琶曲和民乐却听到不多，令人感觉花哨有余，典雅不足，很有点儿本末倒置。这不能不让人深感遗憾。

白居易的《琵琶行》问世之后五百年，元曲大家马致远把它改

编成杂剧《青衫泪》，没有成功；此后又过了近三百年，顾大典将它再次改编成明传奇《青衫记》，惨遭失败；再过一百五十年，蒋士铨重新结撰的《四弦秋》，赢得了时人的很高赞誉；再过二百五十年，也就是人类即将跨进新千年之际，王仁杰用现代人的目光再来重新打量这一题材，将之搬上昆剧舞台。我不敢说王仁杰的《琵琶行》已经超越了前人，也不知道以后是否还会有人来从事这一题材的改编并盖过王仁杰，但我可以肯定地说，王仁杰的改编是有意义的。作为千古名诗《琵琶行》为数不多的改编者之一，王仁杰的勇气，王仁杰的探索，王仁杰的情怀，王仁杰的才华，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尽管这部《琵琶行》还有许多不足，还有不少遗憾，但它必将在当代戏曲史上留下一笔。这是毫无疑问的。